

中文是最难读的语言之一，很少有非中国人每天在中文书摊上看书，却读不出一句话来。作为一个精通它。因此，我们大多数人碰巧生活在中国，擦肩而过结果，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的镜子——实际上是不为人知的而且，它很少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下面这篇文章试图给我们杂志的非中国读者做一个调查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辉煌成就

语言的写作方法已经发生了革命，三千多年的文学风格被抛弃了，一种新的翻译方法开始了，新的诗歌和散文的美丽之花已经在新时代的新鲜光彩中开放了。这种变化是如此迅速和彻底，以至于这一切都发生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中国文学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文学思想向前冲去，跳过许多步，就赶上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这个故事如此有趣，如此独特，尽管困难重重，还是值得完整地记录下来。

## 文学革命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事件是文学革命。这场革命从1917年开始，紧跟着1911年的政治革命。胡适在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下，举起了起义的旗帜(Chen Duxiu) and Chien Hsuan Tung (Qian Xuantong),通过新青年的媒介，并大胆抨击了旧的文学风格。支持者批评继续使用文理体——大声读出来是听不懂的——现在所有国家，包括刚刚皈依的土耳其，都在使用活生生的语言作为交流手段。他们宣称，就实际用途而言，文言文已经死亡，就像拉丁语和希腊语一样，而口语文却活了下来，每天都有新的术语被发明出来，用于各种新的情况。我们没有理由放弃一个正在成长的生命，而去追求另一个已死的、已成往事的生命。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他们坚持认为，由于口语体为所有人所理解，而文字体为少数人所理解，因此不用说，应该将口语体作为标准。胡适及其同事所采用的推广白话文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比具体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了，他们通过勤奋的应用，即写了无数的新文体文章，开始了这场运动。最后，事实确凿地证明，这种新文体能够创作出任何形式的作品，无论是诗体还是散文。由于不懈的努力，整个学生群体都改变了。1919年后，成千上万的学生充满活力和热情地追随他们的脚步。

在几年内，总共出现了大约400种杂志，都是用新风格写的。到1921年，这场运动势不可挡，以至于旧保守派阵营的最后一个据点，the Short Story Monthly, and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他杂志都被改造了，从而迫使公众阅读新的风格，不管他们喜欢与否。后不久。到1928年，所有学校只使用新式教科书。这场运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翻译回顾过去，我们发现，这场运动最初的成功是在翻译领域取得的。在这里，口语化的风格显然是优越的，因此，在运动的头五年里，输出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这个领域。这项工作的核心动力是the Literary Guild,founded 1920年由一群英美留学生和其他有“英语知识”的人创立。他们翻译的书大多是当代的，只有少数古典作家的作品。这样做是为了拓宽中文读者的视野，使他们与现代世界的文学作品密切接触。更适合于再现最初的想法。翻译的书籍包括一些相对不重要的国家，如冰岛、保加利亚、亚美尼亚和南非;在翻译的作者中，我们发现J. Aho, Meric-chakatika, A. A.。哈罗尼安、埃弗塔利奥蒂斯和M.波加西奇。但是，奇怪的是，这些英美留学生翻译的书大部分都是俄文原著，而被翻译得最多的作者是伊万·屠格涅夫，一个没有写过一个英文字的人。

瞿重福通过文学革命，小说译介，原创作品，诗歌创作，小说和出版社、戏剧、儿童读物等多个方面，细致地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全景图。在译介部分他提出，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大多是有旅欧旅美经验的学生，他们的翻译书籍来源大多是来自俄罗斯，在当时被翻译最多的是以个非英语写作的作家，屠格涅夫。

在戏剧部分，不同于前面所提到的章节，作者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戏剧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戏剧在过去30年间是没有发展成果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剧作家，他们没有利用自己的“魔法权杖”去改变惰性的国民。作者在这一章节也提到了当时最火的戏剧“秋海棠”，但是作者对这部戏剧进行了否定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平庸的，古典和现代的奇怪杂交体。不同于主流评论的观点还有：他认为巴金的《家》不过只是一个旧模式的俗套模仿。

整体而言，瞿重福力图在向英文读者传递一个信息：中国现代文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在文章的最后一个标题：“新风格的胜利”，他满怀深情地追忆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无数前人为推动文学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他回看当今的文学发展，指出目前的大多数作家都是有留学经验的年轻人，中国文学的内涵因此得到了丰富。

瞿重福可以看作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中国公民。他热心地关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尽管他指出“欧化语体”的尝试存在着诸多弊端，但是他紧接着就笃定地说这种尝试中的弊病将很快被改善；尽管身在战乱，文学发展面临停滞，但是他满怀希望地在文末提出，正如李白杜甫在安史之乱后迎来创作高峰，中国现代文学也会在战乱后迎来自己的繁荣。面对英文读者，他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树立一种自信和探寻蓬勃发展的可能。